

热历史

# 古代的环境卫生治理

□庄华峰 张华

早在先秦时期,人们就已认识到地理位置、环境、水质等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。如《左传》等书就有关于水土影响人体健康的论述。《左传·成公六年》云:“土薄水浅,其恶易觐,……于是乎有沉溺重膑之疾。”《管子·水地篇》云:“越之水浊重而泊,故其民愚疾而垢。”汉代以降,医家们关于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论述更具专业性。如医学家巢元方在分析南方的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时指出:“南地暖,故太阴之时,草木不黄落,伏蛰不闭藏,杂毒因暖而生。”(巢元方等:《诸病源候论》卷10《瘴气候》)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千金翼方》中著入“择地”,要求居住环境“背山临水,气候高爽,土地良沃,泉水清美”(《千金翼方》卷14《退居》)。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方面,清代医学家徐大椿更有自己的卓见。他在《医学源流论·五方异治论》中指出:“人禀天地之气以生,故其气体随地不同。”在分析了不同地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,他告诫人们,“入其境,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”,因为“所产之物,所出之泉,皆能致病”。可见,徐氏关于地理环境对疾病与医药影响的认识,已较为深入。

鉴于环境卫生与人类健康关系至密,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,主要做法有五:

一是保持房屋内环境的清洁。古人在很早的时候,便注意经常打扫住室。扫地时,恐灰尘扬起,必先洒水。“洒扫”二字,因此成为固定的联绵字。当时不容许随地便溺,连痰液鼻涕,也不许任意吐唾。《礼记·内则》规定:“在父母舅姑之所……不敢唾洩。”不随地吐痰成为一种好的习惯甚至带有礼节的意味。古人对于除鼠非常重视。远在几千年前,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里,已有“穹窒熏鼠”的话,是说发现房子里有窟窿,就用土把它塞住;如果有鼠藏匿在内,就用火把它熏出。蚊、蝇、虱子,也是传染病的媒介,对人类健康有害。先民在很早的时候,就设法加以驱避和消灭。北宋刘延世所著《孙公谈圃》记载:“泰州西溪多蚊,使者行按左右,以艾熏之。”证明在公元10世纪时,已经发明了用焚烧药物来驱蚊的方法,这些对预防传染病流行,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积极意义。

二是讲究厕所的清洁卫生。古人很重视厕所的清洁,有的古书中直接称“厕”为“清”或作“圜”字。《说文》:“厕,清也。”《释名》:“厕或曰圜,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。”大约就其必须清洁言,便叫作“圜”;就其必须加以屏障掩蔽言,又叫作“屏”或“医”(亦作“偃”)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:“观室者周于寝庙,又适其偃焉。”注云:“偃谓屏厕。”可知古人参观人家的房屋,还会去厕所里看看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已经有了公共厕所。《墨子·旗帜》云:“于道之外为屏。三十步而为之圜,高丈。为民圜,垣高十二尺以上。”厕所用高高的墙砌起来,保障个人便溺行为的私密性。到了秦汉时期,厕所有“厕”“溷”“圜”“清”“轩”等多种名称,说明日常生活中厕所得到了普遍使用。

三是重视住宅内外水沟的修浚。如果水沟积污太多,容易引起疾病,所以《周礼·官人》说:“为其井



▲汉代陶楼



▲汉代素面陶井



▲汉代彩绘陶厕

堰,除其不蠲(清洁之意),去其恶臭。”古代建造房屋,有天井,有水沟,即《周礼》所讲的井堰。这种水沟,修建在地下的叫阴沟,即今日所称下水道;修筑于地面的水沟叫阳沟。古人很注意保持水沟清洁,其他绕屋沟渠,也经常加以修浚。汉代王褒《僮约》中规定家仆的日常劳动中,便有“浚渠缚落”“浚渠”,即是修治水沟的工作。

四是关注饮用水的卫生。古人很早就发明了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。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古井距今已5600余年,井口为方形,水井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,并有顶棚覆盖(杨鸿勋:《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》),这说明当时很注意对饮用水的保护。据乾隆二年颁布的《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》载,当时虎丘山前染坊遍布,污水注入河中,致“满河青红黑紫”“各图居民,无不抱愤兴嗟”,于是官府颁布禁令“勒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”,所有“染作器物,迁移他处开张”“如敢故违,定行提究”(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: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》)。这块碑文可说是我国第一件河流水质保护法令。

五是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洁卫生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将居地与公共墓地分隔开,这几乎成为古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做法。二是实行人畜隔离。三是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载:“殷之法,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”,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卫生法。到了汉代更进一步规定路旁居民要以水洒道,以防止灰尘的扬起。由于管理比

本文图片 记者 刘亚 摄

较严格,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形得到制止,有效地维护了公共卫生。当然,使定居生活区的垃圾清除工作走上经常化和组织化则要到清末。如在杭州,光绪二十三年正月,规定由清道局专门负责垃圾清除。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工作改由警察局管理。在常州,光绪三十一年由商会率先创办负责清道的组织,每天安排清道夫打扫主要街道。

纵观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状况,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一是凸显出“天人合一”的人本理念。我国先民很早便重视人与自然、生态环境与疾病的相互影响,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先民的天人合一的人本理念。这一理念从先秦时期庄子的“天与人合一”说,《内经》中“人与天地相应”说,到汉代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理论,再到宋代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命题,都重在强调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来生活,才能保持良好的生命状态,反之则灾祸降临,疾病丛生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,古人的环境卫生观念逐步加强,防范举措日益细致。二是重视环境卫生治理的法制建设。如前所述,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制定有环境卫生方面的法规,规定凡乱扔垃圾于道者要“断其手”。至周、秦二代,对在道路上抛撒垃圾的要施以刑罚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载:“秦连相坐之法,弃灰于道者黥。”虽然秦朝用黥刑(刺面)取代了殷商断手的酷刑,但用法律来管理环境卫生的做法却毫无二致。秦代以降直至明清,对于环境卫生的法制建设一直都未懈怠。如《大清律》规定:“盗园林树木者,予以刑事制裁”。正是由于古代社会重视环境卫生治理的法制建设,为环境卫生的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,历代的环境卫生治理都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三是注重用科技手段推动环境治理。如远在先秦时期就发明了用于排除污水的下水管道,又据《后汉书·张让传》载:“作翻车、渴乌,施于桥西,用洒南北郊路,以省百姓洒道之费。”洒道的翻车、渴乌是汉代掖庭令毕岚制作成功的,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洒水车,堪称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。古人的这些发明,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性,对于推动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《光明日报》

## 史海钩沉 古代耕牛很重要

□周铁钧

在中国,将野牛驯为家养,已有四千多年历史,《路史·后记》载:“伏羲豢养牺牲,伏牛乘马。”意思说伏羲能把野牛野马驯服,当成坐骑。古代,牛是重要农耕、运输工具,拥有牛的数量是国力之象征,东汉《风俗通义·佚文》记述:“牛乃耕农之本,百姓所仰,为用最大,国家之为强弱也。”

中国历史上,各朝代几乎都设规立矩,颁布“牛法”,对牛严加保护。《秦律十八种·厩苑律》曰:“将牧公马牛,马牛死者,亟谒死所县,县亟诊而入之,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,令以其未败直赏之。吏主者、徒食牛者及令、丞皆有罪。”意思是放牧官家牛马,有死亡要立即向所在县呈报,官府检验后上缴。如呈报不及时导致腐烂或私自分尸吃肉,要按活牛马价格赔偿,分管的吏、饲牛的徒,主管的令、丞都要治罪。

唐代的《唐律》规定故意杀死或伤害耕牛致死者,罚刑一年半。《唐律疏议》记载:“马牛军国所用,故与余畜不同,若有盗杀牛者,徒两年半。”当时还规定:耕牛死亡,牛皮、牛筋须上交官府,用于制作战靴、铠甲、缰绳、弓弦等,若藏匿被发现,轻者杖刑,重者坐牢、苦役。

明代,盛行把“牛戒”写成乡规民约,如万历年间的《誓禁屠牛乡约》《申禁屠牛小帖》等,都明细了违犯“牛戒”的惩治条款,且对擅自屠牛吃肉者毒咒恶诅:“天神诛殛,使身生恶疮,家遭凶疫,灭姓坠氏,以偿此牛之命。”地方官府与民间联动,推行、恪守“牛戒”,保证了农业生产对耕牛的需求。 《北京日报》



▲北齐彩绘陶牛车 记者 刘亚 摄

古事汇

## 终南山上有李白

□侯美玲

春秋战国时期,终南山已经名扬天下。公元730年,诗人李白从四川来到长安。当时的长安空前盛大繁华,人才济济,是文人们向往实现理想抱负的地方。因为出身商贾之家,李白被挡在科举制度大门外,年轻的他怀大志,并不满足于舞文弄墨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入仕为官,用一身才情报效国家。在长安,李白遍访当地官员,将自己的诗文送给他们,可那些人只是欣赏他的诗作,并没有向朝廷推荐他。

无奈之下,李白只好效仿卢藏用。隐居在终南山上的李白整天与山水为伴,时而高歌舞剑,时而纵身畅饮。在一个月清风静的夜晚,李白造访隐士斛斯山人,两人把酒言欢,在风入松林的曲调中放声高歌,快乐得忘记了人世间一切烦心事,这个美好场景被他记录在千古名作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宿》一诗中。其间,李白来到终南山上的玉真公主别馆,希望公主举荐自己,可惜公主并没有住在别馆。

高调隐居实为低调炒作,李白隐居终南山的消息还真引起了长安县尉崔叔封的注意,两人一见面就结拜为兄弟。崔叔封不负重托,很快接李白到长安城内居住,还多次向达官贵人举荐他,可惜都没有下文。

离开终南山的李白每天在城内弹琴、读书、赋诗、舞剑、喝酒,只是未能入朝为官,于是再次隐居终南山,最终引起唐玄宗的注意,一纸诏书宣他进宫面圣,并当面授予翰林供奉一职,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,李白的才华终究无法施展,仕途上也没有任何建树,后来只好辞官还乡。 《西安晚报》